

## 論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及其後效\*

[中國] 王攸欣\*\*

當我們細緻關注作家學者的人生經歷，有時會有意外發現。這些年筆者研究朱光潛，追尋其蹤跡，發現朱光潛雖然在成都四川大學只待了一年多（1937. 8. -1938. 12.），但此期的生活對他後半生具有重大影響，可以說，他1940年代中後期的捲入政治漩渦，19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遭受超出一般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壓力，他承受改造時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態度，以及後來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都和他在成都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讀者往往只閱讀了朱光潛的代表性著作《文藝心理學》等，就誤以為朱光潛是一個沉浸于超功利審美，而不太介入社會現實的美學家。甚至有些研究者也並沒有全面細緻地研究朱光潛的所有文本及其人生經歷，就徑直以朱光潛自己所宣言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概括朱光潛1950年代以前的學術。這都與朱光潛的實際學術歷程及具體學術成果有著較大的距離。朱光潛從其開始進入香港大學從事學術活動起，就一直相當積極地呼應時代文化思潮，並較大地受到他所處學術環境的主導學術話語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涉及到他所選擇的學科、學術方式，也涉及到他的一些具體的學術觀點。當然，朱光潛也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追求，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承受影響，他幾乎總是比較自覺地調整著個人獨立性與主流意識形態、主導學術話語等外在因素的關係，一方面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獨立思考，另一方面獲得主流學術話語甚至權力話語的認可。他早年（29歲去英國留學以前）確實不太介入現實政治，但那是和他作為青年才進入社會尚未站穩腳

\* 本文據作者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中大會發言論文修訂而成。

\*\* 中國湖南湘鄉人，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特聘教授。

跟而為職業操心的身份有關的，即使如此，他也在浙江春暉中學的學潮中，支持了學生方面，出走上海，與他人一起創辦了承載著他的教育理想的立達學園。在留學英法的八年中，他基本上潛心學術，努力掌握當時歐洲的主流學術話語，他以英文寫作的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標誌著他對這種話語方式的熟練運用。1933年回國，他以更符合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中國化西式學術話語的《詩論》初稿，受到胡適的欣賞，聘任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最初幾年，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致力於大學的教學，舉辦文學沙龍，希圖養成良好的文學風氣。1937年，開始主編《文學雜誌》，他已經很明顯地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介入當時文壇的文學觀念和文化觀念之爭，對“用低下手腕或憑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論的自由”之文壇風氣進行了嚴厲的批評<sup>1)</sup>。這一年，他與巴金、曹禺及左翼文壇，與梁宗岱、梁實秋等發生了多場論爭，有的相當激烈——還不算魯迅對他的批評。不過此時，朱光潛還是一位書齋學者、教授，還沒有捲入具體的人事和政治紛爭。

1937年8月朱光潛到成都，最關鍵的變化，是他的社會身份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原來的沙龍學者、教授一變成爲四川大學文學院長，使得他更多地從事實際的人事工作，也使得他在教育部以程天放取代張頤爲四川大學校長時，以領袖姿態率眾而起，反對程天放到校，掀起了一場影響很大的風潮。這場風潮既使國民黨的高層如蔣介石、張群、陳立夫注意到他，也使延安負責文藝、宣傳的周揚等人注意到他。國民黨高層注意到他，是他後來成爲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並在1940年代後半期，發表激烈政論，反對學生運動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共產黨方面如郭沫若、邵荃麟、蔡儀對他進行嚴厲批判的原因。所以，1950年代初，他一度受到司法管制，並成爲北京大學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兩位重點改造對象之一。而周揚與他的來往，成爲他在1957年展開的美學大論爭和反右運動中受到保護的一個原因，也是他後來能夠成爲馬克思主義美學之代表人物在高校美學教育中成爲主導流派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以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論證這一長期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

1) 見《文學雜誌》，1937年第1期朱光潛所作發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

1937年6月，因為夫人陳衡哲所寫散文《川行瑣記》批評諷刺四川社會狀態閉塞，生活習俗落後，引起四川輿論不滿，同時由於與地方關係不夠協調等其他原因，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憤然辭職，推薦文學院長、中國第一位在牛津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哲學教授張頤代理校長，得到教育部長王世傑同意。於是張頤著力聘請北平著名教授到四川大學。張頤原是北大教授，哲學系主任，與朱光潛有過交往，因此有所瞭解，知道朱光潛學識淵博，甚為欽佩，於是在正式上任之前的6月20日，發電報極力邀請朱光潛任文學院長，希望能夠在學術建設上有所作為。<sup>2)</sup> 朱光潛本來頗為猶豫，但1937年7月，日本軍隊入侵華北，尤其是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華北局勢非常緊張。7月底，日軍佔領北平，其時，北大、清華都已放暑假，但下個學期是否開學並無確定日期，且直到8月底，國民政府對北大、清華等大學一直沒有適當的遷移計畫和安排，並宣示9月份所有教授工資停止發放，因此朱光潛頗為焦慮，同時也考慮到家庭問題——他妻子奚今吾是四川南充人，岳父奚致和是四川著名紳士——而四川地處後方，周圍地勢險要，足為戰爭屏障，相對較為安穩，於是終於決定到成都四川大學就職。

1937年8月12日，朱光潛與楊振聲、沈從文等一行，在戰亂中南行，途經天津、青島、濟南、南京，一路風塵，擔驚受怕，倍歷艱辛。到南京後，朱光潛獨自西行，奔赴四川成都，就任文學院長，並兼歷史系主任。這一次赴蜀，離開了他已經熟悉、認同的京派文學圈，也離開了以胡適為中心的代表著當時主導學術話語的自由主義學術群體，這種中國化西式學術話語一方面是朱光潛

2) 為了讓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文學院長胡適支持朱光潛到川大，張頤專門寫信給他們，希望他們幫助勸說朱光潛去川大到任。原信如下：“孟鄰適之學長兄鑒：近常以歡[引者按：當為勸]挽叔永[按：任鴻雋字]一事，電函相擾，其結果乃遭大投艱于弟身。辭謝非川大同人所許，擔任又恐力有所不勝，惟有央懇諸公鼎力維持而已。弟昔年在廈，蔡先生曾慫恿北大同人赴彼幫忙，此次想亦同此態度。兩公意態固絕不至與蔡先生相抵牾也。昨曾電邀朱孟碩[按：當為實]兄來此擔任文學院院長。弟于孟碩平時雖極欽佩，然晤聚時間卻不甚多，務懇請兩公極力為我勸駕，弟在此倘以無人相助而塌台，亦非北大之榮事也。此頌近祺 弟張頤再拜”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4卷，第29-30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從信的內容來看，張頤完全是從學術而非私情出發請朱光潛的，他也希望蔣、胡發揚蔡元培精神，不阻撓而支持朱光潛到川大。

已經習慣並熟練地運用的，但另一方面，一直對朱光潛心中存在的對於中國文化傳統和審美傳統的依戀之情又有所壓抑和規訓。所以，這一次離開，對朱光潛在四川發生的學術和文化轉向實際上發生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在四川期間和新儒學的一些師友如馬一浮、熊十力、劉永濟、錢穆等人的交遊，促使他在文化資源的取向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原來他主要直接以西方化的學術話語介紹西方文化學術成果，1940年代他更多地傾向於從中國傳統文化發掘精神資源，寫了《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統的基礎》、《陶淵明》等論文。

朱光潛一旦決定就職，就相當投入。首先就是加強文學院的師資力量，敦促張頤已經聯繫的清華大學心理學教授葉麐應聘教育系主任，另外聘請了他的武昌高師同學、老朋友語言、歷史學家徐中舒到歷史系任教授，聘請他在北平慈慧殿三號自己家中主辦的文學沙龍“讀詩會”中的常客羅念生、周煦良、卞之琳等和顧綬昌到外文系任副教授或講師，大大增強了川大文學院的力量<sup>3)</sup>。朱光潛積極配合校長管理全校工作，張頤也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四川大學總共十六個委員會中十三個委員會的委員，並任出版委員會主席，《國立四川大學學報》主編和圖書委員會常委。

朱光潛到成都，和才來成都的其他年輕人如卞之琳、何其芳一樣，感覺到這裏風氣相對閉塞，文化氣氛比較沉滯，於是在何其芳的提議下，與卞之琳、方敬、羅念生、謝文炳等一起創辦了一個小型半月刊《工作》，卞之琳主編，何其芳主稿，每人輪流出印刷費，宗旨是“宣傳抗日戰爭和支援社會正義”<sup>4)</sup>，希望能影響四川風氣。當時何其芳、方敬、卞之琳等思想上都有同情延安的傾向，且何其芳、卞之琳不久後都曾前往延安。朱光潛在《工作》雜誌上發表過

3) 關於朱光潛聘請卞之琳、周煦良等人，可以參看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人尚性靈，詩通神韻：追憶周煦良》等文，均收於《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卞之琳《何其芳與〈工作〉》，見《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5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方敬《意氣尚敢抗波濤——憶朱光潛先生》，也提到該刊“其宗旨是宣傳抗日戰爭，揭示大後方陰暗側影，抨擊時政弊端”，見《朱光潛紀念文集》，第21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幾篇文章，其中《露宿》就是記敘自己的逃難歷程，控訴日本侵略者。《再論周作人事件》則是以他對周作人性情的瞭解，並通過常風最近談及周作人生活情況的來信，為周作人辯護，認為周作人當時尚未投敵。在成都，尚沒有過這種性質的刊物，所以《工作》頗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朱光潛在成都的日常生活直到學校發生易長風潮以前，還是比較愜意的。朱光潛最初沒有帶妻子同行，住在四川大學的菊園即“皇城”內教員單身宿舍，不久奚今吾帶著朱光潛第一個妻子陳氏之子世粵也輾轉來到成都，一家在校外租房居住，朱光潛相對安穩地享受天倫之樂和悠閒的成都生活。朱光潛和朋友們感受最直接的是成都的物價出奇的便宜，即使在抗戰開始階段也沒有太漲價，他們經常光顧成都的一流飯店“不醉無歸小酒家”、鎮江樓，也到一些著名的小吃店如吳抄手、賴湯圓、邱老糟、王胖鴨、至德元、矮子齋等品嚐道地的風味小吃。他常和妻子在居處附近的少城公園（按：今改名人民公園）漫步——少城公園的茶座鶴鳴茶社、綠蔭閣茶館有名的清雅，朱光潛和朋友們經常在這裏品茶聊天，對比北平和成都風物之異，再遠一點西門外有著名的青羊宮，杜甫草堂遺址和草堂寺、武侯祠等，青羊宮的花會是最有名的，異常熱鬧，實際上是一個盛大的廟會——這是世粵的天堂——風車、泥人、木馬、小花籃，各種形形色色的小玩具，全是靈巧的手工製作，讓世粵新奇興奮不已，朱光潛讓他滿載而歸，自己也在古董攤和書畫攤流連，偶爾帶上幾件小玩意回家，可惜這種愜意生活好景不長。

朱光潛在川大僅僅呆了一年多的時間，易長風潮就起來了。風雲際會，朱光潛成為此次風潮的領袖人物，第一次參與爭取學術自由的權力和政治派系之爭。張頤作為純粹的學者，代理校長職務，致力學術、廣攬賢才，使學校順利發展，但並沒有主動融入到官僚體制中去，尤其沒有疏通與新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的關係，陳立夫作為國民黨的黨務專家，試圖加強大學的黨務工作和對學校的控制，於是任命才從中國駐德大使退下，屬於CC系的政客，號稱“四大金剛”之一的程天放為四川大學校長，取代張頤。這與朱光潛作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教育理念衝突，再加上朱光潛與張頤關係甚好，頗為他抱不平，於是他聯合

理學院院長魏時珍、農學院院長董時進，舉起教育自由、學術自由的旗幟，聯合致電重慶行營主任四川人張群，請求中央收回成命，電文由朱光潛主筆：

頃見報載，川大校長於學期中途無故變動，校務進行極感困難。校內群情感然，擬請我公顧念桑梓，婉致當軸，暫緩明令發表，用維教育，而息流言”。<sup>5)</sup>

又召開教師大會，主張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收回成命，並發表公開宣言，反對程天放到校，會議推舉朱光潛起草宣言，朱光潛也不推託，以他如椽之筆，揮灑他擅長的古文：

四川為今日抗戰後方重地，四川大學為今日全國僅存之完整的最高學府。人事進退，匪僅關係一校，實為抗戰全局視聽所系。自更換校長之[消]息披露於報端後，同人等服務川中，與聞較切。除已陳電當局，請即收回成命外，茲特以所見為全國關心教育之人士瀝陳之。大學作為高深學術人才之機關，學術理想貴在保持自由獨立之尊嚴，遠離潮政之波蕩，研究工作，尤需環境安定，不容輕易更改。歐美各國對於大學校長人選，必求其學術精深。一經任命，決無無故紛更之理。今加以撤換，使全校師生研究工作，頓受影響。後何人尚肯實□人口，此同人等所認為不可者一。後方教育事業於政治、軍事、社會一切設施□□□□關，當抗戰前途千鈞一髮之際，後方人心之安定，實為首務。川大自抗戰以來，全校師生對研究學術之外，努力救國工作，尚無愧於國家。今于全校無問題之□，忽生翳問題，風聲所播，竊恐人存觀望，影響一切事□，有礙抗戰工作，此同人所認為不可者二。國家興亡，系於士氣。養士之（來）道，節操為先。近

5) 原載《新民報》（成都版），1938年12月16日。轉引自王東傑博士《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第257頁，三聯書店，2005年版。該書史料詳實，本文關於朱光潛在川大拒程運動中的經歷，除了參考了朱光潛自述、方敬《意氣尚敢抗波濤——憶朱光潛先生》、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與其他回憶文章外，主要參考了該書，在此特致謝意。下文所引朱光潛所擬宣言，均轉引自該書，不一一作注。這些宣言《朱光潛全集》失收，因此不避繁冗，一一轉錄。

年以來，從事政治活動者，往往排斥異己。世風日下，國亦隨之。為校長自宜獎勵學術，專心教育，人格皎然者，然後足為青年師表。今必欲去潔身自好之學術界先進，流弊所及，影響士風。此同人等所認為不可者三。以上三點，為同人等共同之認識，為今後進退之標準。事關教育學術前沿，揭諸國人，以求公論。<sup>6)</sup>

宣言義正詞嚴，重點落在學術界不容以政治排斥異己，以無人格的政客取代純粹的學者，影響士風上。簽名者以朱光潛領頭，包括魏時珍、董時進等共56名教授。因為朱光潛領導了這場風潮，既引起了陳立夫的關注，也引起了共產黨的關注，朱光潛致信當時已經到了延安的何其芳和卞之琳，表示要去延安看一看<sup>7)</sup>，而沙汀和周文也把朱光潛在拒程運動中的情況報告延安方面，延安文藝界負責人周揚即寫信給朱光潛，邀請他去延安參觀，信到時，朱光潛已離開成都到了樂山武漢大學，因此未成行。但時任四川大學教務長的孟壽椿與張頤不睦，迎接程天放主校。陳立夫為維護政府和自己權威，電令張頤服從政令，移交校長職務，並且責成他導正教授，勿使學校前途發生不良影響。另一方面，派人調查拒程人員的政治背景。張頤接到以教育部名義發出的電令後，批示各院長及全體教員知曉，電令的命意和措辭激起教師們憤怒。

朱光潛等人召集教師集會，朱光潛主席，在會上慷慨陳辭，痛斥陳立夫專橫顛預，蔑視大學教授人格，主張全體罷教，以示抗議，同時發動成都本地士紳掀起反程運動。會議贊同罷教，並再次公推朱光潛草擬罷教宣言和駁斥教育部電文。朱光潛連夜寫就罷教宣言和致教育部電，宣言強調教師的人格尊嚴：

本校校長問題，同人前為維持學術尊嚴，陳述意見，公諸社會。頃由張校長轉到教部來電，謂為出位幹政，敗壞學風，並謂校長有導正之責。披覽之餘，不勝駭異。竊同人以學術界之人談學術界之事，何為出位幹政？同人在校並未製造派系，利誘生徒，何為敗壞學風？院長、教授皆由

6) 原載《新民報》，1938年12月18日。文中“□”號系報紙原文不清晰之字。

7) 原信已不可見，據卞之琳回憶，信的內容是表示想去延安走一走。見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47頁。

學校禮聘而來，與校長不過暫時賓主，迥非主管僚屬之比，何得言受其導正?!教部之電，實屬不明體制，蔑視教授人格，同人認為此學術界莫大恥辱。自本日起，不再到校任課。特此聲明，伏維公鑒。

此聲明一方面顯示官僚體制漠視教授人格，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當時的教授還敢於昭示自己的獨立人格，亦屬不易。駁斥教育部的電文朱光潛更費心思，說理也更加充分，主要為反對官僚主校，主張學術獨立，甚至直接指斥教育部無事生非、擾亂抗戰，有害於抗戰時期的國家利益，顯示了朱光潛以四川大學同仁為後盾的獨立立場：

查本大學更動校長問題，引起校內校外重大糾紛。所有經過情形，大部容或未能盡悉。“勿使學校前途，發生不良影響”，具見尊重學術，維護教育之意。同人等敢不將事實真象及所持理由，為大部一詳陳之：

竊大學校長地位，與普通行政官吏不同。進退黜陟雖由政府，而其道德學問必為社會所公認，而後可以為人師表。故政府有任免之權，而社會實司其選擇之任，非可純用政治權力，強之服從。使學術界教育界人士，一切如小吏之于長官，奉事惟謹而已也。故歐美大學校長，多行推選之制，其尊重學術，因而推崇大學教授地位，不以尋常法令格之，意其盛也。今推選制雖不行于吾國，然大學教授對於校長問題，自述其意見，以為本身進退之標準，而乃謂之出位幹政，豈普通言論自由，出處進退自由，一經置身國立大學，遂為赫赫威令所剝奪乎？此同人所不解者一也。

大學教授有發展文化領導社會之責。平時在既定國策之下，自由講學。遇國家多事之時，無論政治法律外交，乃至國策之修正，或受政府諮詢，而發抒讜言，或自陳所見，以供社會採擇，皆為國法之所容許，賢明政府之所樂受。漢制，博士與九卿、中二千石會議大致。君主時代，猶且重視學術人才如此。即在近年，如上海十教授之本位文化宣言，及最高領袖所召集之廬山座談會，教育問題之外，大學教授尚可自由發表主張，況對於政府任用大學校長之標準，陳述意見，公諸社會，無觸犯忌諱之辭，無牽涉私人之語，尤無所謂阻撓政府行政用人之意，何得目之為出位幹政？此同人所不解者二也。

且以學術所得貢獻政治，則政治可期改善；以政治之力束縛學術，則



學術日就衰敗。故欲保持學術機關之尊嚴，但於既定國策之下，不使有擾亂政治之行，此外，不以政治手段幹之，不以派系私意行之。所以然者，懼其以勢利而亂學術之公是公非也；懼其使學生懼于威武，誘以利祿而隳其節概也；懼政治權力，利用學術機關，以惑亂社會之視聽也。而大學校長之唯一選格，必其學術湛深，操行純潔，為學術界教育界所推服而不營營於政治活動者。若其人具政治長才乏教育興趣，而以之為大學校長，非用違其長，則別有用意。二者無一而可。知其不可，而曰此政府命令也，服從之而已，是則非大學教授所宜出也。大部以同人此舉為敗壞學風，不知敗壞學風之責，究應誰屬？此同人不解者三也。

校長之于教授，非如長官之于僚屬。聘任之始，自當慎重人選，既聘之後，則當儘量使之發揮其學術能力與主張。又當尊重其人格與地位，不容干涉其個人言論行動。此次同人發表宣言，動機純潔，不受意于任何要人，不就謀於任何黨派。況在張君，自有志趣，豈同人所得而制之？而同人所欲為，又豈為校長者所得而約束之？校長非尊官，同人實否認其導正之權，而大部以此責之張君，此又同人所不解者四也。

又大部電中目同人為少數院長教授。查本大學設文理法農四學院，院長四人，教授八十餘人。列名宣言者，朱光潛、魏嗣鑾、董時進三院長也，林思進等七十餘人，皆教授也。大部有案可查，其不為少數甚明。此則事實真象，大部或為人蒙蔽，而未能盡悉，尤不能不為大部鄭重聲明者矣。

要之國家垂危，至於今日，我最高領袖之宵旰勤勞，全國人士為之艱苦奮鬥，只為民族生存，爭最後之勝利而已。語曰：“白刃在胸，目不暇瞬。”我政府宜多為有利抗戰之舉，少做後方不必要之事。如學年中途，而更張平靜無事之大學，同人所謂不必要者也。惟大部慎重權衡而措施之，國家幸甚！全國教育幸甚。

但教育部長陳立夫，並沒有想要尊重民意，不僅通過各種手段，分化教授陣營，並深入調查參與風潮者的政治背景和人際關係，以關注他們的動向。總之，權力不顧民情，使程天放強行到校任職。朱光潛又擬就致蔣介石等人電：

教部立言失體，致激動公憤，演成罷教。……現在新任校長程天放未

約定交代日期，竟於梗日到校，劫奪印信，強為接替。內外嗤鄙，紛擾益甚。竊念川大易長問題，教鈞座維護教育，尊重學術，歷年對於川大扶持獎掖，尤具苦心。無非為國家培養士風，為民族闡揚文化。復興之效，實基於是。今此完整之大學，忽亂清甯之學風，推演所屆，將使士類蒙羞，群情沮喪。上負蓋猷，下泐民志。國難當前，豈宜有此？光潛等身居大庠，出處進退自有節度。惟事有關學術消長，事業興壞，與夫鈞座所兢兢愛護者，公正發憤，義不容已。近日默察情勢，深知程天放不治輿情，恐難繼任。似宜別簡學行俱優，聲望素孚之士，接長川大，以慰士林之望，以系川人之心。不揣冒昧，敢舉所知如胡適、李四光、任鴻雋、王世傑、陳啟修等學術湛深，行誼端正，物望所歸，足備斯選。鈞座領導全民，盡瘁國家，素以汲引人才為重，敬乞一言主持，俾後方安定之。大學得復常軌，不特芸芸學子沾被大德，全國學術前途實賴之。

再次反對程天放任校長。實際上，朱光潛等對蔣介石抱有的幻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權力的威嚴問題，而決不會是學術獨立、文化建設的問題。所以，蔣介石反而責成四川軍政當局，協助程天放到任主持校務。拒程沒有成功，朱光潛、張頤只好立即打點行裝，敗走遷移在嘉定樂山的武漢大學<sup>8)</sup>。這次風潮，朱光潛出演了悲劇主角——這個角色表明了朱光潛決不只是一個看戲者，而且他之出演主角是和他的社會身份的變化有密切關係的，甚至與個人利益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從中也可看到，朱光潛並不是一個如一般讀者和研究者所瞭解的，似乎總是沉浸在超功利審美中的學者，而是一個敢於介入現實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事實上，接下來的幾年，朱光潛更激情地介入了具體的政治鬥爭，包括在樂山武漢大學的再次拒程運動，在北京大學時期發表反對學生運動的政論等。到武漢大學兩年以後，因為多種原因，朱光潛出任教務長，不僅更多地介入各種人事調節，同時在學術上也轉向更多地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資源<sup>9)</sup>。武漢大學沒有形成像北平那樣密切的文化學術圈，他和新

8) 據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回憶，朱光潛與挺程派達成了妥協，“一方面不拒新校長，一方面不許動全校人事”。這一說法，並不能掩蓋實質上的失敗。卞之琳本人因為到過延安，不久就被四川大學解聘。

9) 朱光潛儘管極力反對教育部長陳立夫對程天放的兩次校長任命，但陳立夫經過調查權

舊朋友之間的交往，只是鬆散自由的個人關係。而事實上，他和後來被學術史稱為新儒家的一些著名學者都有或密或疏的交往，如他和馬一浮、熊十力、錢穆、賀麟、方東美等人，都有直接的交道，關係都還比較密切，他甚至還聽從熊十力的勸告，細讀過熊氏的《新唯識論》和一些佛典如《成唯識論》等，他和另一位新儒家馮友蘭也有商榷文字之交（他們在北平是舊相識），另外和舊學名家劉永濟、徐天閔、葉瑛等，也交往頻繁。因此，在北平新文化圈多少受到壓抑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依戀和關注，就開始凸現出來。1941年，他和張其昀、郭斌和、馮友蘭、賀麟、錢穆等傾向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民族精神重建資源的一批學者，組成思想與時代學社，創辦《思想與時代月刊》，致力於闡發傳統文化之精神。抗戰期間，朱光潛所寫學術論文不多，最重要和精彩的都是對於中國傳統或如何承接傳統的研究。因為他的學術影響力，也由於他的文化和政治傾向，朱光潛於1940年代先後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對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也痛心疾首，提出改造國民黨的方案，這些都影響了朱光潛後來的學術和人生歷程。而成都可以說是朱光潛積極介入具體的人事和政治鬥爭的起點。

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可以部分地證實我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對其學術人格的論斷，但因這段經歷，主要不是學術經歷，朱光潛在此期間，也沒有具體學術成果，所以又不能全面證實這一論斷：

總的說來，朱光潛以積極入世而非出世的精神，密切關注且積極感應時代文化思潮，在學術歷程的每一個階段，都努力介入主導學術話語，卻盡力保持著與意識形態話語尤其是權力話語或遠或近的距離——這種距離

衡，頗為籠絡朱光潛，在朱光潛任教武漢大學期間，破格禮遇，特邀他到重慶晤談，並且經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推薦，同意任命朱光潛為武漢大學教務長，把朱光潛拉入國民黨，推舉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讓朱光潛於《中央週刊》上發表文章。見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48頁。仔細體會朱光潛當時的文章和學術轉向與陳立夫破格禮遇的關係，筆者認為這很可能是朱光潛後來捲入政治漩渦的相當重要的一步。

往往由權力話語的強制性程度所決定——他或自覺或下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個人情感、個人話語與時代學術大環境以及所處學術小環境的關係，同時，也著力表現出在主流學術話語框架內的獨立思考，由此而獲得相對獨立的學術價值和相當程度的主流學術話語的認可。在學術人生歷程中遭遇挫折時，他能以相對超脫的態度和較為柔韌的個性，執著於不肯離主流話語的學術追求。在人生踐行中，他對個人權力與物質利益較為超脫，但也積極介入各種論爭甚至人事、政治派別的鬥爭。“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或許確實是他的人生理想，卻並沒有充分地顯現在他所做的人世事業上。朱光潛學術上略為欠缺孤行獨往，一空依傍的精神特質。在筆者有限的見識範圍內，沒有看到過任何人對朱光潛學術人格作出類似概括，而我認為，這是把握朱光潛每一次學術選擇甚至人生選擇的非常關鍵的精神特徵。<sup>10)</sup>

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及其後效讓人感歎，一個學者進入行政體制後，對其學術歷程可能發生始料未及的影響。當然，就朱光潛而言，我認為儘管這一經歷影響到他的學術選擇甚至政治選擇，使他更緊密地感應於時代潮流和主流意識形態，對他的學術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他作為一個有建樹的學者，自有其學術根基，他也多少在尋求自己的相對獨立性，而避免使負面影響完全摧毀其學術，還是有值得敬重欽佩的一面。這對於一般沒有他那麼深厚功力的學者而言，是很難的。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進入權力體制後的學者，往往就會按照體制本身的邏輯去思考問題，去調整自己的價值標準，甚至還不容易達到朱光潛那樣的獨立程度。應該說這初看上去有其理由，甚至可以說理由很充分，有時甚至似乎是不得不然。但這應該說很可能背離了人文學術的根本價值。筆者認為，人文學術和主流體制的目標是很不一致的。人文學術之價值一方面是更深透地認識人性和社會，另一方面又是通過其相對超越的立場，超越既有體制的局限，對社會根本性的利益分配及整個社會關係作出相對公平的調節——也就是建立一種超越特定的社會權力話語體系的立場，對於社會利益和人際關係作出調節。所以這實際上就是所謂人文學科的無用之大用，這也是儘

10) 王攸欣《論朱光潛之學術人格》，尚未正式發表，該文對這一論斷有詳細論述。

管現代社會完全功利化，但人文學科也還是能夠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因為中國現代文學本身以及學科的傳統，在理解人性和社會這方面應該說是做得相當好的，已經影響了整個社會，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在超越性方面做得還是不夠充分的，可能我們學科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樣一種作為人文學科根基的最重要的價值根源。當然，這也是現在學界的普遍問題，其他學科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更嚴重，相當一部分學者，一旦進入權力體制，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在現有體制的框架內考慮學術標準、追求目標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不一定比其他學科差，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年會，我只能呼籲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同行應該更多地在這方面努力，才能建立更好的學術發展良性循環的機制。這不僅涉及到現有學術水準提升的問題，也涉及到現代文學學科在現有學科體系中的價值問題，更涉及到下一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培養問題。一個學科要對中國當代社會有所貢獻，獲得社會影響力，我覺得應該在這方面更下功夫。一個學者也只有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建立穩固的根基，才可能真正做到不為權力體制所左右。

### 參考文獻

-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3年版。
- 朱光潛主編《文學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1948年版，中有間斷。
- 胡喬木等《朱光潛紀念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胡適等《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版。
- 卞之琳《卞之琳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王東傑《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
-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馬一浮《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王攸欣《選擇·接受與疏離》，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
- 王攸欣《朱光潛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Zhu Guang-qian's experience in Chengdu and its influence on  
Zhu Guang-qian's academic life

Wang You-xin

Zhu Guang-qian's experience in Chengdu for more than one year influenced his later academic life. During those days, the most critical thing for Zhu Guang-qian was the change of his social identity from scholar, professor to dean of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Sichuan University, which caused Zhu Guang-qian to take more part in the practical personnel work and lead people against Cheng Tian-fang's coming into Sichuan University whe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ointed Cheng to replace Zhang Yi as the presid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e above far-reaching unrest launched by Zhu Guang-qian not only made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s of KMT, such as Chiang Kai-shek, Zhang Qun and Chen Li-fu, pay attention to him, but also made Zhou Yang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concerning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in Yan An to noticed him. The KMT leadership's notice of Zhu Guang-qian was the important cause for Zhu Guang-qian's later appointment a member of the KMT Central Supervising Committee and make intense political comments against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40s, and also was the indirect cause for Zhu Guang-qian to incur harsh criticism from the CPC, such as Guo Mo-ruo, Shao Quan-lin and Cai Yi. Therefore, in the early 1950s, he was the focus of thought reform in Peking University. Zhu Guang-qian's experience in Chengdu played as the landmark in his academic career. Before the experience, Zhu Guang-qian's academic work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academic discourse, but after the experience, more by the impact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in details.

Key Words : Zhu Guang-qian, Chengdu, Unrest, influence

투 고 일 : 2011. 1. 10. / 심 사 일 : 2011. 1. 20. ~ 2011.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2. 17.